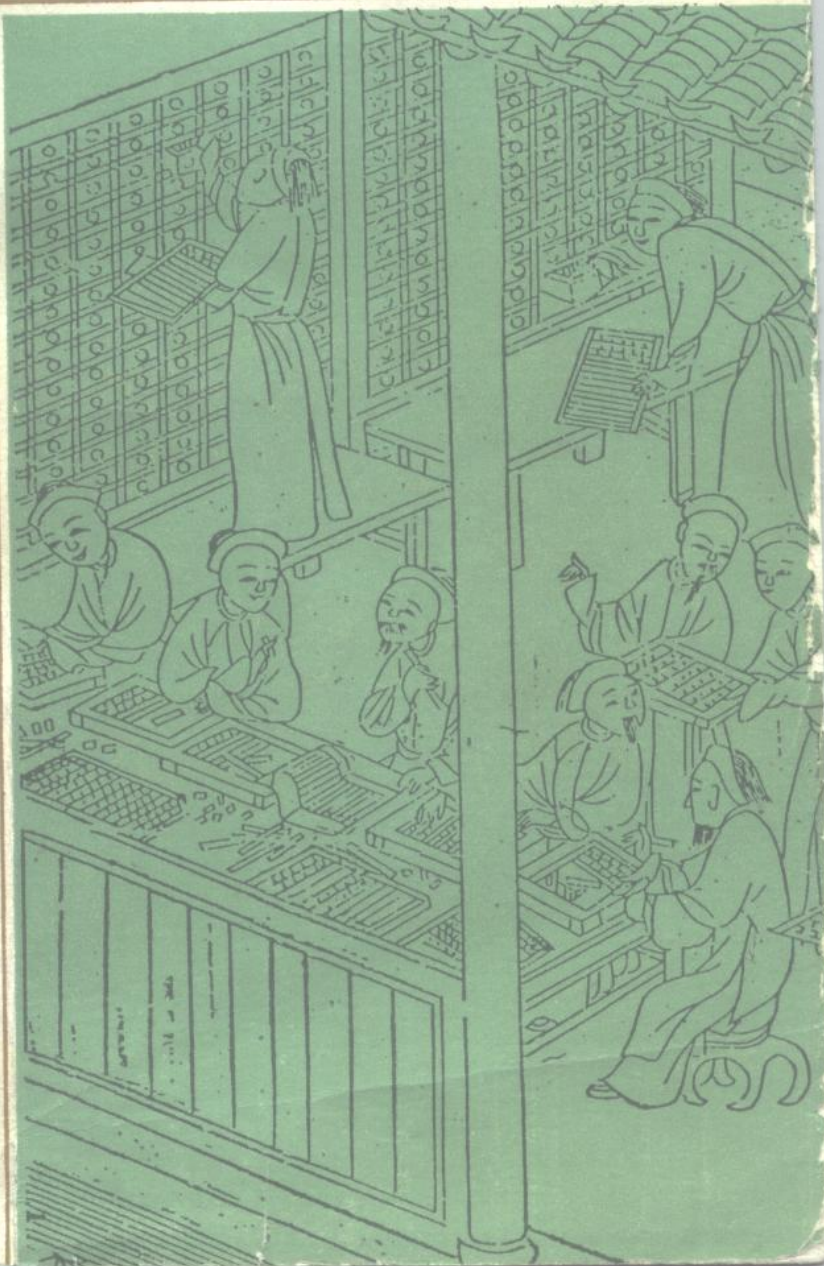


中国印刷
史料选辑

活字印刷源流

THONGGUO YINSHUA SHILIAO XUANJI ZHONGGUO YINSHUA SHILIAO XUANJI
HUOZI YINSHUA YUANLIU

歷代中有布衣畢昇又爲活板其
知錢屏每字爲一印火燒令堅先



TS8-092 100795
90-3
2

活字印刷源流

《中国印刷史料选辑》之二

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印刷印钞分会编

印刷工业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活字印刷源流》是《中国印刷史料选辑》之二，选辑了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发展，以及后世对毕昇活字印刷术的研究、实验等文章 33 篇，基本上汇集了印刷发展史上我国传统的活字印刷方面的史料和有代表性的各家言，展现了迄今在活字印刷史领域的研究成果和争鸣概貌。

活字印刷源流

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分会编

*

印刷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外翠微路2号)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8.875 字数：229千字

1990年8月 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4.90元

ISBN 7-80000-054-0/G·5

出版说明

印刷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对世界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为国内外学者所重视。由于印刷术发明年代久远，加之我国古代轻视科学技术，致使文献记载贫乏。国内外热心于印刷历史研究者只能依据文献上的只言片语进行分析、考证和判断，对印刷术发明年代等历史问题长期争论不休、莫衷一是。而这些争鸣中之各家言，又因刊物发行面之局限和时间上的差异，很难为读者所共览。本书的出版，旨在将印刷历史研究上之各家言汇集于一书，提供给读者，以帮助读者了解各家观点及其依据，从而得出更加切实的判断，将印刷历史的研究推进一步。同时也为后世留下较为完整的印刷史料。

为便于读者查阅，本书按文章内容分四册出版：一为雕版印刷源流；二为活字印刷源流；三为历代刻书概况；四为装订源流和补遗。

本书所收稿件，均非原作，几经排印、抄录，错字甚多，而又难以查证，虽经精心审改，然疑惑之词不敢贸然更动，只好遵从来稿。对原作插图，因图稿质量和照顾全书体例等原因，部分插图有所割爱，并统一安排图序，至希鉴谅。

本书的选辑者是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分会。该会在洪荣华同志领导下，在收集革命印刷史料的同时，着意于中国印刷史料的征集和整理。印刷工业出版社在此基础上略有调整和增删。

在搜集本书资料过程中，得到全国各地有关部门的热情支持；编选工作中，又得到王益、史育才、方厚枢、张秀民、郑如斯等同志的鼓励、指导和帮助，王益同志在百忙中为本书挥笔作

序，在此一并致谢。

印刷工业出版社编辑部

1989年12月25日

2011/09/12

目 录

总序：重视印刷史的研究和学习	(1)
中国活字印刷简史.....	(6)
中国活字小史.....	(66)
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	(89)
中国活字印刷术之检讨.....	(101)
中国古活字.....	(107)
现存最早的活字印书.....	(111)
宋代杭州的刻书与毕昇发明活字印刷的地点.....	(115)
我国雕版印刷术与活字印刷术的比较研究.....	(121)
浅释活字印本.....	(130)
我国最早的金属活字.....	(135)
明代无锡会通馆印书是锡活字本.....	(139)
铜活字的发明与发展.....	(145)
铜活字与印刷术起源问题.....	(154)
华氏与铜活字.....	(159)
清代的铜活字.....	(162)
西夏文木活字版佛经与铜牌.....	(170)
元明两代的木活字.....	(179)
清代的木活字.....	(190)
新发现的泥活字印本——《泥版试印初编》.....	(207)
翟金生的又一种泥活字印本——《试印续编》.....	(211)
清代泾县翟氏的泥活字印本.....	(216)
泾县水东翟村发现泥活字本宗谱.....	(222)
关于翟氏泥活字的制造工艺问题.....	(223)

关于翟金生的“泥活字”问题的初步研究·····	(229)
我省发现泥活字印的书·····	(233)
泥活字本《修业堂集》简介·····	(234)
泥活字印刷的模拟实验·····	(238)
清代泰山徐氏的磁活字印本·····	(243)
一部珍贵的磁版印本《周易说略》·····	(249)
是磁版还是磁活字版? ·····	(251)
我国古代的活字印刷术为什么发展缓慢·····	(256)
十九世纪上半叶西方人对中文活字之研制·····	(267)

总 序

重视印刷史的研究和学习

王 益

不久前在《北京晚报》上看到一篇文章，题为“印刷术故乡里的‘陌生人’”，抱怨在发明印刷术的故乡，竟然找不到一本讲印刷史的书，跑了几家印刷厂和图书馆均无所获。关于印刷史的研究，在我国是很不发达，但情况比作者描述的要好一些。他不到书店去找，可见他对书店不抱希望。完全正确，在书店中是不会找到他需要的书的。这是我国出版发行工作落后的特征——出版的书不少，能买到的不多。至于图书馆中也找不到，我怀疑作者没有认真找，因为至少在北京图书馆和首都图书馆等大图书馆中是可以找到一两本印刷史方面的书的。我藏书并不多，但在我的书架上，有关的书有好几本。

印刷史知识的普及工作和印刷史的学习，也是做得很不够的。讲解印刷史的通俗读物，出版很少；电影、幻灯片，都没有见到过，更不用说印刷博物馆了。印刷史的学习，也不被重视。印刷厂的同志，从厂长到工人，可能都不读这方面的书，所以在印刷厂中找不到。如果有人读过，那么他真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印刷工作者了。我曾建议印刷工作者看一点印刷史方面的书，但反映并不热烈。印刷工作者也往往不研究印刷史。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没有人研究印刷史，印刷院校也不开印刷史的课，没有专门研究和讲授印刷史的教员。研究中国古代印刷史的人大多是研究古籍版本和目录的专家。关心我国近代现代印刷史的人多一些，

但也缺乏有计划的系统的研究。研究欧美日本等国印刷史的人更少。介绍西方印刷史的专著，好象没有出版过。《北京晚报》那篇文章的作者不禁慨叹道：“自建国以来，印刷史的研究始终处于‘业余爱好’的层次”。这句话，概括得非常好。

至于我本人，严格地说，还算不上一个印刷工作者。我是一个热心印刷事业的出版工作者。对于印刷史，当然没有研究。我只是读过几本论述我国印刷史的书，读过一些论文和资料。读了之后，感到很有益处。

卡特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吴泽炎译，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和张秀民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人民出版社1958年初版，1978年再版），其著作过程，令我深受感动。

卡特是美国人，大学毕业后，到中国观光，学了点汉文，决心致力于中国印刷术的研究。他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写成了世界上第一部全面论述印刷术发明的背景、演变及其传播的权威著作。一个外国人，写成这么一部书，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他阅读了无数的中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等各种文字的论文、专著、资料。他向各国的专家学者请教，在书上提到名字的就有30多人。他的书出版后的第二年，他就因病去世了，存年不过43岁。这部书成为他一生的唯一贡献。

张秀民，1931年大学毕业后，进入当时的北平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做古籍编目工作。他读了卡特的书的部分译文后（当时没有全译本），认为该书很有价值，但还有不足之处。而且印刷术是古代我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发明，印刷史却由外国人代庖，感到不是滋味，立志要写出一部更好的《中国印刷史》来。因此，他在编目的同时，注意收集有关版本印刷的资料，写成大小笔记约70本。他放弃了午睡和星期天的休息时间，把馆中所藏全部宋版书约350种翻阅了一遍；对所有明嘉靖重抄《永乐大典》残本200多册，数千种地方志、诗文集、笔记杂说及日文、西文版本

目录书，也都涉猎了一番。这样勤奋，这样严谨，做了这么多准备工作，才在1952年着手撰写《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195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60年日本京都出版了日文版。这是一部在国际上很有影响的可以补卡特不足的权威的学术著作。

卡特和张秀民的书，给了我很多知识。不仅雕版印刷术是中国人所发明，而且活字印刷术也是中国人所发明。中国已经利用造纸术和印刷术大量印书的时候，欧洲各国仅能用笔在羊皮上抄写《圣经》。从明朝开始，中国的科学技术才逐步落后于欧洲。读了这些书，可以提高中华民族的自豪感、自信心和使命感，激发起发愤图强的雄心壮志。这些书是很好的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

印刷是一种应用技术，又是一种工业。印刷工作者主要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技术工作者，一部分是经营管理者。我觉得两部分人都需要读一点印刷技术和印刷工业的发展史。现代的印刷技术，突飞猛进，难道还要向已被淘汰的古旧落后的技术去学习吗？现代的印刷工业是大生产，需要的是用现代科学武装起来的先进的经营管理，难道还要向落后的手工业作坊去学习吗？但是，我们知道：应用技术，属自然科学；经营管理，属社会科学。不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它们的进步和发展，都有一定的继承性。新的发明和创造，都不是突然自天而降，都是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都经过一个逐步积累和吸收的过程。后一代人的科学研究，必须以前一代人已经达到的终点为起点，不能把现代科学同过去的研究成果截然割裂开来。学习现代的科学技术的同时，回顾一下前人走过的道路，不是没有益处的。最通俗的话就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当然，历史的借鉴和启发作用，有时不是那么直接、明显和立竿见影的，但它是确实确实存在的。我们决不能忽视它，小看它。

可喜的是，印刷史的研究，正在不断前进中。据张秀民介绍，留美学者钱存训博士所著英文版《纸与印刷》已作为英国李

约瑟博士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的一部分出版。该书系钱博士苦心钻研十年的成果。它列举了许多西方文献，证明西方人所谓“印刷之父”谷腾堡的印刷是受中国的影响，是一个很大的贡献。中文版已译出，正在校勘中。

张秀民继《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之后，在物质生活非常菲薄的条件下，不顾年老体弱，又完成了多达54万言的更完备、更系统的力作《中国印刷史》，把中国印刷史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该书上海人民出版社已决定出版，正在排印中。我衷心祝愿它早日与读者见面。

由于党中央重视党史资料的征集和研究工作以及各地注意地方志的编撰工作，近几年来，对于印刷史资料的征集和研究工作有很大的进展。印刷专业杂志经常有印刷史方面的文章发表，印刷工业出版社也重视印刷史书籍的出版。这些都是令人高兴的事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上海一批以洪荣华为首的，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新四军和华东解放区从事印刷工作的同志，（以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组的名义）在收集和编辑出版革命印刷史资料的同时，也收集了三十年代前后散见在报刊上的有关一般印刷史资料文章，编辑成内部参考资料出版。印刷工业出版社认为这些资料有广泛的阅读和研究参考价值，正在进行整理，准备正式出版发行。从1981年起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和印刷工业出版社开始编辑出版《中国印刷年鉴》，1984年文化部批准由中国印刷技术协会成立中国印刷博物馆筹备委员会，目前有许多同志正在酝酿成立中国印刷史研究会，这些都有利于印刷史研究工作的开展，值得欢迎。

虽然如此，我们仍应看到印刷史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发展，任重道远，并不是轻而易举之事。中国印刷博物馆筹备委员会成立到现在，已四年有余，没有一点踪影，实在遗憾。有关我国古代发明印刷术的实物资料，建国以来，也很少有新的发现；现存的实物资料有哪些，存放在何处，也缺乏调查研究。总之，工作做得

很不够。主要问题在于,对印刷史研究和学习的重要性,还没有引起印刷界和有关各方面的普遍重视,需要做更多的扎实的工作,进行宣传 and 解释,予以推动,使印刷术故乡里的“陌生人”越来越少。

1989.4.12

中国活字印刷简史

张秀民

前 言

1961 年左右,义乌吴晗先生为普及历史知识,计划出版《中国历史小丛书》,在北海漪澜堂宴请李俨先生、侯仁之教授等。余亦被邀,请写一些印刷史方面的小册子。余乃写了《活字印刷史话》,由北京图书馆参考组同事龙顺宜同志抄誉,收入小丛中,1963 年中华书局出版(1979 年二版三次印刷)。此小册子约一万余字,过于简略,乃于同年又写成《中国活字印刷史》,约四五万字。翌年出资雇人复写三份,不久浩劫开始,未能出版*。

余旧作《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只不过是《中国印刷史》的首尾两章,其中缺少自唐、五代、宋、辽、金、西夏、元、明、清代印刷史的主体。1971 年退休回嵊县瞻山老家后,为完成全部印刷史,乃多次辞谢北图及南北数大学之邀请,奉老母家居,克服种种困难,潜心继续写作。数次至浙江省图书馆,再三增删订补,1985 年始将全部《中国印刷史》五十四万字稿子交付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春,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张树栋先生来书,欲将余五十多年来所写之印刷史论文汇编为一集,乃挑选旧文三十三篇送去,来书告已发稿付排。

惟此《中国活字印刷简史》以字数过少,出版社不便出单行本,

* 当时应上海教育出版社之邀写作的《古代书籍和印刷》小册子,也向该社索还,今犹存复写稿一份。

乃交由《中国印刷》杂志分五期刊出。

此书中对于纸的发明人仍认为是蔡伦，前数年报上大力宣传的所谓西汉“灞桥纸”等均不可信，已详见新作《中国印刷史》。宋绍熙四年(公元1193年)周必大用胶泥铜板移换摹印自著的《玉堂杂记》，填补了宋代活字印书之缺，新作中已介绍台湾黄宽重先生的这个新发现。书中称“清绍兴府八县无县无宗谱，尤以山阴会稽多至一百三十种”。近年我嵊县因新修县志，需家谱作参考，据最近调查所得，全县尚存各姓宗谱五百二十部，均为浩劫中烬余之物，完整者不及十分之一，因县图书馆无处藏储，仍散藏四乡。

书中据余旧作，称朝鲜李氏王朝先后铸字二十次。其实据东亚印刷史专家瑞典友人(美国籍)艾思仁先生 S. Edgren 寄来的资料，朝鲜铸造金属活字先后达三十四次(内铜字二十六次、铁字六次、铅字二次)，除三次为私铸外，余均为政府所铸。据说朝鲜近年发现高丽忠烈王廿四年(公元1298年)印造的《清凉答顺宗心要法门》，为现存世界最古的金属活字本，比在巴黎展出兴德寺铸印的《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高丽印本，还早七八十年。朝鲜又存有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庚子铜字本《真文忠公文章正宗》、《资治通鉴纲目》、宣德九年(公元1434年)甲寅铜字本《唐柳先生集》，都比《谷腾堡圣经》要早数十年。

余新作《中国印刷史》亦有活字一章，略述活字术的发明与发展，惟与此书内容详略不同，又缺活字本的形式与内容，及嵊县谱匠独创之排字盘与工资生活等，两者可以互相补充。其中偶有失误，新作已加改正，入夏以来因忙于整理交阯史料，亦无暇再订补此书，书中谬错自知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1988年9月16日，张秀民书于
瞻山十八都老家，时年八十一岁。

自序

西洋人所谓印刷术，通常专指活字印刷术而言。一般人以为是德国人约翰·谷腾堡发明的。十九世纪中叶法国汉学家茹莲把宋沈括《梦溪笔谈》所载毕昇活字板一节，译成法文，于是欧洲人才知道在谷腾堡以前，中国人早就发明了这个“神圣艺术”。不过有的人以为毕昇发明的只是泥活字，而金属活字则仍是谷腾堡等首先创用。其实中国的锡活字与朝鲜的铜活字和铅活字，都比谷腾堡的铅字要早几十年，甚至一、二百年。因此发明金属活字的荣誉，仍应该归功于中国与朝鲜劳动人民。

大家知道活字印刷的重要性，而我国又是最早发明的国家；但是过去却未有专书记载，中外学者虽偶有论著，亦多属于零星介绍。笔者对于这个问题素感兴趣，多年来收集了一些资料，最近两年把它整理补充，将我国活字板的发明与发展情况，及其影响，活字本的形式特点和活字印工等，粗加论述，写出这本约五万言的小书，作为这方面的尝试。由于水平与见闻所限，自然是很不成熟的。其中误谬缺略，更难避免，尚请读者指正。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八日于北京图书馆

我国是发明纸张与印刷术的国家。这两桩伟大的发明都是人类文化史上的大事，对于世界文化的贡献是无法估计的。自从东汉元兴元年(公元105年)蔡伦用树皮、麻头、破布、鱼网等废料，造成真正的植物纤维纸张^①，人类这才找到价廉物美最轻便的理想的书写物。因此，凡是纸张到了那里，就受到那里欢迎。并且逐渐代替了旧有的竹、木、缣、帛、埃及纸草、树皮、兽皮、羊皮等书写材料。从此各地纸写本的书籍先后产生。我国魏晋六朝以来便有大量纸写本，现在北京图书馆还保存着唐朝人纸写本佛经

八千七百三十四卷，纸墨多完整如新。而且其中有数卷是六朝写本，离现在已有一千五百多年了^②。

但是，一本书要一字一句地用手抄写，实在太费时间，又容易抄错，一次则只能写出一份，很受限制。一旦毁灭，便即失传。为了让书本更广泛流传，我们的祖先发明了雕板印刷术。书籍由手抄而进入印刷复制的时代，是一件了不起的事。雕板印刷术是凸板印刷术的一种，它是利用梨木板或枣木板，刻上反写的字或图画，在凸起的字画线条上，涂上黑墨，铺上纸用棕刷在纸上刷印。把印出来的纸片加以装订，便成书籍。用这种方法来复制图书，可以使一部书同时化身为千百部，所谓“不烦染翰之劳，可遍普天之内，使人皆持诵”，这就是印刷术的功劳。比起一字一句用手抄写，其难易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了。

大家知道我国首先发明这种雕板印刷术，但对于发明的年代，中外学者说法不一，是一个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现在一般大致同意发明于唐代说，而在唐朝的具体年代上，又有不同的说法。根据明代史学家邵经邦(公元1491—1565年)《弘简录》卷四十六的纪载，唐太宗李世民为了纪念他已故的帝后长孙氏，“梓行”了她的遗著《女则》。所谓“梓行”就是刻板印行的意思。这部有关妇女的作品或作十卷，或作三十卷，可说是现在所知最早的刻本书，时间大约是在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左右。又据唐冯贽《云仙散录》载著名的玄奘法师每年用“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方，每岁五驮无余”。根据以上两则文献，我们可以说唐初贞观年间(七世纪上半期)我国便已发明了雕板印刷术^③，比欧洲大约早七百多年。到了唐肃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后，陕西长安京城东市已出现了新兴的印书铺，如“上都东市大刁家”印了历书，京中李家于东市印《新集备急灸经》一卷。当时长安的东市与西市是四方商品与手工业集中地，有“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④，而大刁家、李家印书也都在东市。后来，穆宗长庆四年(公元824年)扬越间多作书“模勒”白乐天及元微之

杂诗，在街市中出卖。宣宗大中元年——三年(公元847—849年)纣干泉在江右(今江西)做官时，雕印《刘宏传》数千本，寄给京城及各地炼丹的人。司空图于咸通十年(公元869年)后为东都敬爱寺和尚募化重雕《律疏》，可见初刻本更在其前。至于私商雕卖历书，更是普遍。每岁司天台未颁下新历前，剑南、两川(均今四川)及淮南道(今苏北安徽一带)均以“版印历日”出售于市。文宗为维持政府威信，于大和九年(公元835年)明令禁止“诸道府不得私置历日板”。广明元年(公元880年)僖宗入蜀后，官历不及江东(今江苏南部及浙江一带)，而市有印卖者，因争执月大月小不同，而引起诉讼。可知唐代中叶后，刻书地点除陕西长安外，已扩大到如今河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川等省了。中和三年(公元883年)柳玘在成都书铺看到的阴阳杂记、占梦、相宅、字书、小学，大都是雕板印成。现在可考的唐代成都书铺有剑南四川成都府樊赏家印历书，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西川过家印行佛经，可知成都已成为当时出版中心之一。

唐代印本书存者寥寥如星凤。在敦煌发见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王玠印造的《金刚经》一卷，是举世闻名的现存第一部印本书，也是印本书中有插图的第一本。用七张纸印成粘成一卷，全长十六尺。卷首佛像板画，已很出色。连同几部印本历书和其他大量古写本，可惜都被英国帝国主义分子斯坦因盗运到伦敦去了。

五代十国是我国历史上四分五裂的动乱时代，但刻书事业却是蒸蒸日上，仍然得到发展。前蜀、后蜀、南唐李氏，以及东至青州(今山东益都)西至瓜州、沙州(今甘肃敦煌一带)，都先后刊行书籍或佛像。尤其吴越国忠懿王钱俶笃信佛教，一再印造《宝篋印陀罗尼经》，每次八万四千卷，分装湖州天宁寺和杭州西湖雷峰塔内。又西湖南山永明禅寺延寿和尚(公元904—975年)在钱俶大力支持下，更大量印施佛经佛像。甲戌(公元974年)开雕二十四应观音像板，王赐钱千贯，用绢素印二万本。又尝印《法界心图》七万余本，以及其他佛经咒语甚多。他不但用纸印，还用丝织品